

试析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法兰克福 批判社会理论与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关系

孔刚 阎静

(南京大学 江苏大学 江苏南京 210000)

【摘要】 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深受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尤其是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历史唯物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社会理论,都为以科克斯和林克莱特为代表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基本观点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社会理论 国际关系批判理论

马克思主义内容宏大,在社会科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社会理论深受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的影响,在哲学理论领域独具特色。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都为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形成与基本理念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三者存在着理论上的历史关联性。厘清前二者与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渊源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内涵和特点。

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

马克思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社会批判哲学,其基本功能就在于“理论批判”。马克思哲学继承并发展了康德的批判哲学,将其批判精神与对理性的限制加以发扬,承认异化对人产生的束缚,承认权威对人的约束,承认精神自由是人的解放的重要前提,以及承认人可以通过批判理论与自身的本质结合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又是一种实践哲学,它明确指出人的解放要以消灭私有制为最终过程,理论的批判必须与实践的批判相结合才有意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严肃的社会批判理论,必须以实践为导向。因此,这种实践哲学又成为最高意义上的批判哲学。

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前提,是人类可以从历史环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其批判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把人类从历史的沉重负担下解脱或解放出来。这些沉重的历史负担包括那些使人们受到压迫的各种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如何朝新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方向转变,使被压迫阶级分享过去完全由统治阶级独占的财富,克服民族间和种族间的各种障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使用“生产方式”的概念来考察人类历史的进化过程,把这一过程看作是生产方式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一系列逻辑顺序,认为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塑造历史的社会环境是人类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当然,马克思所指的社会环境是与阶级斗争紧密联系的,而阶级斗争的结果是产

生新的存在阶级压迫的社会制度。

创立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虽然该学派的理论体系庞杂,但其最重要的思想渊源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尤根·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批判社会理论接受了马克思学说的上述基本前提。但法兰克福批判理论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压迫归结为控制生产方式为基础的阶级统治,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形式的统治,例如以性别、种族、宗教、族裔、民族主义等为基础的统治。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解释的范式存在着以下局限。第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缺乏对自由概念的分析,尤其缺少把自由概念同国家权力、父权制度、种族压迫或民族主义等范畴联系起来深度分析。第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缺少一种充分有力的历史社会学,论述多谈论生产过程,少注意国家的建构、战争形态、道德与文化的复杂性质等方面;基本没有一个系统清晰的社会秩序理论。^{[1](P669)}由此,哈贝马斯等把理论创新的重点放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缺失上,他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批判性改造,提出了著名的“沟通理性理论”。

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在社会实践的一般标题上把相互作用归于劳动,即把交往活动归之为工具活动,忽略了人类沟通行为的作用。”^{[2](P33)}作为目的理性行为的生产活动是社会进化不可缺少的动力,而作为“沟通行为”的“道德—实践活动”的理性化过程,则意味着人们的道德意识和实践能力的提高,它同样也是社会进化所不可缺少的动力。这两种理性化过程对于社会进化的解释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甚至后者更为根本。新的社会结构的产生,依赖于个体沟通能力的提高,而个体沟通能力的长进,又可以提高社会沟通网络的整体水平,导致道德实践意识的提高。但哈贝马斯在瓦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概念之后,并未对其基本范畴弃之不理,而是以此为参照系提出了一套以“沟通理性理论”为核心的新的理论框架来实现批判理论的深层次转换。在哈贝马斯的引导下,法兰克福学派的基本信条是:人类理性是人类解放的基础。通过理性的力量,人

【作者简介】孔刚(1977—),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生。

阎静(1971—),江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类自身拥有对社会进行根本的或革命性变革的能力。认为人类理性有三种模式:工具理性、战略理性和沟通理性。其中沟通理性是一切话语的前提,是评判个人认知和社会组织的标准。就批判理论而言,其任务就是要高扬人类的沟通理性,将之从技术工具理性和社会战略理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重建理想语境下主体间自由沟通和理解的前提条件。^{[3](P139)}

二、国际关系批判理论

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形成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20世纪80年代,以罗伯特·科克斯(Robert Cox)、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等为代表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家,把批判社会理论应用到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从本体论、认识论等方面向国际关系主流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发起冲击,形成了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流派(这里专指受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欧洲社会学传统、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狭义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

以科克斯为代表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主要以意大利共产党人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和政治思想来考察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建立他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分析框架。他认为,批判理论最有前途的形式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发掘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辩证法、帝国主义、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以及生产过程等方面的思想,提出了独特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历史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即人的行为是由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共同决定,他用这一方法分析了人类活动的三个领域(生产、国家形式和世界秩序)及其它它们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在三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社会力量(或阶级)、各种国家形态和霸权与非霸权世界秩序如何被具体、历史地塑造的。霸权世界秩序既体现了三种力量在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领域的统一,又体现政治/市民世界的世界性双重领导。科克斯还着重分析了当前生产国际化条件下的全球性的社会阶级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产生的全球治理及其潜在的全球危机,并提出了一些改造旧秩序的战略。

作为批判理论的开拓者,科克斯理论的最大优点在于批判。科克斯借鉴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关于批判理论的哲学论断,提出了有关“问题解决理论”和批判理论的理论分类。认为“理论总是服务于一定的人和一定的目标的”^{[4](P199)}。问题解决理论则不然,是“服务于符合既定秩序的国家、部门或阶级的特殊利益的理论”^{[5](P231)}。要清理新现实主义中的“问题解决理论”的负面影响,就必须重视批判理论的批判功能,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冲突理论、帝国主义论、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理论特别是将生产进程解释为特定历史形式的观念,纳入到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中。

以英国的林克莱特为代表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正是从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获得了资源,并发展出其对于世界政治结构的历史社会分析,以此展开对新现实主义的批评。林克莱特系统地论述了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关系,并着重从阶级、不平等、不公正等马克思主义传统术语角度分析国际关系。他认为批判理论是对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

超越,它摒弃了马克思主义忽视国家存在的现实和不以国家为关系单位的缺陷,同时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类普遍自由、解放的道德诉求,从而有可能建树一种较为理想的解释范式。^{[6](P19)}

林克莱特深入地探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说,尤其是哈贝马斯的著作。他认为,重建由马克思发轫的历史唯物主义,其中关键的主题是使传统的“生产范式”转变为新的“沟通范式”,建立一个更综合的历史社会学,观察和回答马克思最先提出但未能解释的问题^{[7](P666)}。林克莱特把哈贝马斯的理性分类运用到国际政治理论分析中,认为国际社会存在着3种理性化,即技术—工具理性化(人类学习如何控制自然)、道德实践理性化(人类学习如何建构秩序和社会公意)和战略理性化(人类在实际或潜在的冲突情势下如何把握和控制他人)。在国际政治理论界,技术—工具理性化与强调生产力、世界经济决定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是相联系,战略理性化与新现实主义密不可分,而道德实践理性化则成为以林克莱特等为代表的革命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内在本质内容。^{[8](P171-172)}显然,林克莱特与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绝大多数国际政治学者一样,重视国际间沟通理性或道德实践理性的作用,并致力于探索在国际体系内重新实现道德生活、自由沟通秩序的可能性,反对与自然科学联系密切的实证主义技术—工具理性以及社会领域中以实施政治控制为目标的战略理性对人、国家等行为体的压迫。林克莱特关于道德实践理性可以有共处原则的理性化模式的思想,反映了自康德以来、经法兰克福学派发扬光大的理性批判精神在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政治理论界的某种内在的、强烈的诉求。○

注 释:

[1][7]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2]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3]Habermas.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M]. Boston: Beacon Press, 1979.

[4][5] 罗伯特·基欧汉主编 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Andrew Linklater, Beyond Realism and Marxism: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New York:St.Martin Press, 1989.

[8]Andrew Linklater. Beyond Realism and Marxism: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 London: McMillian Press, 1990.

[9]The Achievement of Critical Theory—from International Theory:Positivism and Beyond in Steve Smith,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96.

责任编辑 晏蔚青